

## 佐米亚视野中的南亚研究及其反思

章立明

**摘要:** 18世纪中期以来,南亚因地理位置、族群构成及其历史际遇而成为区域研究的热点地区,国外学者的南亚研究揭示了部落民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与社会转型等内容,既为英印殖民政府实施间接统治以及南亚国家社会治理提供依据,又为从学术角度检验与反思佐米亚理论提供了可能。现有的南亚研究成果丰富了对佐米亚形成原因和动力选项的分析,加深了对于高地民族的非同质性理解,同时也推动了学术界对佐米亚的理论反思。虽然从地理位置来说,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毗邻佐米亚区域,而囿于第一手材料的短缺,中国学术界却从未对包括东南亚和南亚在内的广大区域进行过完整与统一的关注,其中尤其以对有关南亚的知识生产最为薄弱。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在东南亚和南亚等周边地区的推进,迫切需要从微观视角针对地方层面进行实证研究,对佐米亚相关区域的研究有望成为中国学术的新增长点,通过跨国的学术合作、研究区域细化以及应用性研究等,既有为中国政府制定推动南亚“一带一路”项目顺利落地政策提供借鉴的现实意义,又能对佐米亚理论进行更为平衡的解读。

**关键词:** 佐米亚; 南亚研究; 高地民族; 族群关系; 学术新增长点

**收稿日期:** 2023-02-15

**作者简介:** 章立明(1968—),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南亚人类学。

2002年,范·申德尔把从喜马拉雅山南麓与青藏高原以东一直到中南半岛的山地称为“佐米亚”(zomia),<sup>①</sup>2009年,詹姆斯·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一书中,以高地部落民“逃避统治”的行为来建构理解东南亚高地历史的佐米亚理论。从地理位置来说,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毗邻南亚与东南亚等传统的佐米亚区域,特别是“生活在其中的藏族、傈僳族、佤族、布朗族、傣族、

---

<sup>①</sup> Van Schendel. *Willem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Society and Space*. 2002, 20(6), pp. 647-668. 佐米亚(Zomia)一词中的(Zomi)是从藏缅语系Chin-Mizo-Kuki词根中衍生出来的部落民自称,申德尔添加后缀“a”表示空间含义。

《南亚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2期,第138—151页。

哈尼族和苗族等都是东南亚历史与现代进程的见证者与亲历者。”<sup>①</sup>而囿于第一手材料的短缺,国内学术界却从未对包括中国西南地区、东南亚和南亚在内的广大区域进行过整体的关注,其中尤其以对有关南亚的知识生产最为薄弱。<sup>②</sup>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在东南亚和南亚等中国周边地区的推进,对相关的佐米亚区域进行研究有望成为中国学术生产的新增长点。

## 一、作为区域研究高地的南亚研究

自从18世纪在孟加拉省落脚以后,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北上寻找进入西藏的陆地通道,而阿萨姆平原正是其必经之处,纷至沓来的旅行家、传教士、东印度公司使者(英印政府官员)和学者为这一地区贡献了数量众多的游记、考察报告与民族志著述;而印度独立(1947年)、中印边界冲突(1962年)、孟加拉国建国(1971年)和不丹修订《国籍法》(1985年)等历史事件更使得这一区域成为国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积累了一批包括人类学调查局简报、政策评估报告以及人类学民族志在内的第一手资料。也就是说,200余年来的南亚研究已经成为检验学科理论和丰富研究范式的学术高地之一。

### (一) 南亚的地理历史与民族族群

南亚地区是世界上最具地理历史丰富性与民族族群多样性的区域,是世界学术研究,特别是区域研究的重点区域之一。

南亚地区主要由一系列的山地(丘陵)组成,包括喜马拉雅山的延伸山脉、加洛山(Garo Hills)、卡西山(Khasi Hills)、贾迪亚山(Jaintia Hills)、米克尔山(Mikir Hills)以及南部与布拉马普特拉河接壤的北卡查尔山(North Cachar Hills)、最东面的米什米山(Mishmi Hills),而作为印缅边界的帕特凯山脉(Patkai Range)、那迦山(Naga Hills)、曼尼普尔山(Manipur Hills)和路赛山(Lushai Hills)一直从东部延伸到了东南部,此外,由布拉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iver)和巴拉克河(Barak River)冲积而成的阿萨姆平原(包括阿萨姆河谷与巴拉克盆地)也是这一区域的代表性地形与地貌。

自13世纪以来,对由高山(丘陵)环绕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正式称呼是阿萨姆地区,“当地的部落民把傣—泰民族建立的阿洪姆(Ahom)王国称为掸人土地(Ha Shan/Siam),阿萨姆(Assam)一词就是由该词音变而来”。<sup>③</sup>1817年,缅甸贡榜王朝趁阿洪姆王国衰落之机向西扩张,1822年完全控制了阿萨姆河谷,把曼尼普尔和卡查尔等土邦也一并纳入自己的版图。从1824年起,东印度公司(英属印度

① 章立明:《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南半岛山地跨境族群研究》,《世界民族》,2017年第1期,第60-72页。

② 本文所说的南亚研究对象处于欧亚大陆、南亚次大陆以及缅甸板块的交汇点,在这一区域分布着尼泊尔、不丹、印度和孟加拉国4国。

③ 何平:《从云南到阿萨姆——傣—泰民族历史再考与重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页。

政府)先后发动了三次英缅战争,特别是第一次英缅战争彻底地改变了阿萨姆的地理版图。《杨达坡条约》(*Yandaboo Treaty*, 1826)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缅甸放弃对阿萨姆和卡查尔等(土邦)的土地要求,承认曼尼普尔的独立地位等,至此阿洪姆王国的内政外交大权全部落入东印度公司手中,如1833年双方签订的《高哈蒂条约》(*Guwahati Treaty*)就允许东印度公司在阿萨姆河谷驻军,6年后阿洪姆王国宣告灭亡,成为东印度公司的阿萨姆省。1874年,卡查尔和萨地亚(*Sadiya*)等地也被并入阿萨姆省,1905年,阿萨姆省与孟加拉省直接合并,两年后正式并入英属印度的版图。

## (二) 南亚的民族族群

生活喜马拉雅山脉的民族包括尼泊尔的廓尔廓人(*Gurkhas*)、塔芒人(*Tamang*)、夏尔巴人(*Sherpa*)、藏人、马嘉人(*Magar*)和尼瓦尔人(*Newar*)等,不丹的竺巴人(*Drukpa*)、沙尔乔普人(*Sharchop*)、噶隆人(*Ngalong*)和洛沙姆帕人(*Lhotsampa*);生活在阿萨姆地区的印度那迦人(*Nagas*)、米佐人(*Mizos*)、库基人(*Kukis*)、卡西人(*Khasis*)、特里普拉人(*Tripuras*)、加洛人(*Garos*)、贾迪亚人(*Jaintias*)和查卡玛人(*Chakmas*)等以及孟加拉国的孟加拉人(*Bengali*)、比哈尔人(*Bihari*)和作为13个部落民总称的朱玛人(*Jumma*)等。

从1864年英属印度和不丹战争结束以后,大量的尼泊尔人开始进入不丹南部开垦荒地,经过数个世纪的移民成为不丹的第二大族群洛沙姆帕人。1985年不丹修订《国籍法》并发起“复兴传统文化运动”,把超过10万的洛沙姆帕人排除在合法公民之外而成为难民,随着难民人数的剧增,在不丹的尼泊尔人最终成为影响尼不关系稳定的动荡因素之一。自1971年以来,尼泊尔的印度移民人数开始出现爆发性增长,截至2001年,来自印度的移民在600万—800万之间,<sup>①</sup>严重地挤占了尼泊尔人的就业空间,而大量非法移民云集在尼印两国的边境地区,对尼泊尔的安全形势造成严重的威胁。

从19世纪英属印度开发阿萨姆地区开始,来自孟加拉省、比哈尔省以及尼泊尔的移民开始涌入阿萨姆地区,特别是第三次印巴战争中的孟加拉难民和非法移民更是大批涌入,从而引发外来族群与本地族群(平原人与部落民)在自然资源、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等方面的剧烈争夺,更加激化了原先阿萨姆地区平原人与部落民之间的矛盾,这些多重交织的族群矛盾成为引发南亚地区社会动荡的导火线。1937年,缅甸从英属印度中分离成立英属缅甸,1947年,英属印度分裂成为印度与巴基斯坦两个共和国,这样一来,生活在印度东北部的加洛人、卡西人、米佐人和那迦人等部落民就成为实际的跨境而居族群,1971年以后来自孟加拉国的信仰印度教和穆斯林的难民大量涌入,使得阿萨姆地区的族群构成更加多样、族际关系更加复杂以及宗教类型更加多元,于是宗教族群问题成为引发该地区社会长期动荡的主要原

<sup>①</sup> 王宏伟:《尼泊尔:人民和文化》,昆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9页。

因。如 2019 年 12 月 12 日，印度总统签署《公民身份修订法案》（*The Citizenship Amendment Bill-CAB*）决定给予 2014 年 12 月 31 日前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进入该国的数百万非法移民（除穆斯林以外）以公民身份，由于从孟加拉国进入的移民主要滞留在阿萨姆邦、特里普拉邦和西孟加拉邦，当地居民担心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非法移民涌入而不堪重负，最后“在西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爆发了已导致多人死亡的严重骚乱”。<sup>①</sup>其实这份备受争议的法案被视为印度政府边缘穆斯林，并制造宗教极端对立的举措，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而导致数千人被捕，造成激烈的社会动荡，严重地影响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 （三）南亚研究的主要成果

在南亚地区无论是北部高耸的山峰还是南部茂密的森林里分布着数以百计的部落，他们彼此之间文化差异极大，有时相邻部落之间的语言也不相通，然而早期非专业作者留下的关于南亚行程路线和经历见闻等，还是为南亚研究保留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梳理 200 余年来这些林林总总的成果，我们大致可以把它们划分为游记与民族志成果两大类型。

#### 1. 直接为殖民统治服务的考察报告（游记）

自 17 世纪进入南亚次大陆以来，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将目光瞄准喜马拉雅山北麓的西藏，而当时人们所知的由印度进入西藏的主要道路是西线的尼泊尔与东线的不丹，而通过东印度公司使者对印藏通道的报告，东印度公司才知道锡金也具有入藏的地理条件，其实这种鲜明的目的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在东印度公司寻求与西藏建立的所谓“友谊”上。1772 年，东印度公司利用不丹同孟加拉北境的库赤一比哈尔土邦（Koc — Bihār）发生的冲突，以保护后者为名，出兵占领了不丹境内的军事要塞。1774 年，应不丹德布王的请求，“六世班禅喇嘛致信孟加拉省的总督沃伦·赫斯廷斯（Warren Hastings）请他停止对不丹的侵扰”。<sup>②</sup>为了取得班禅喇嘛的信任，赫斯廷斯立即停止对不丹的用兵，并请求允许东印度公司派员前往札什伦布寺回访。1774 年 11 月，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一行经不丹到达日喀则，他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乔治·波格尔出访西藏纪事》<sup>③</sup>，波格尔与班禅的“友谊”成了东印度公司派人入藏的最佳借口。1800 年，塞缪尔·特纳（Samuel Turner）的使藏报告（中文译名《西藏札什伦布寺访问记》）出版，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该报告都是东印度公司以及不列颠英国了解西藏地理与人文的主要依据。

到 19 世纪末，有关南亚地区的旅行日志、探险报告和英印政府官员的见闻录也

① “印度骚乱启示：西方双标矛头锁定中国，这不奇怪”，环球网，2019-12-1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3079965859252165&wfr=spider&for=pc>

② 黄万纶：《谈谈英国在近代对西藏的经济侵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 年第 4 期，第 62-65 页。

③ 1876 年与曼宁（Thomas Manning）的游记合编出版。



陆续面市,近年多部成果由印度出版社多次再版。如1835年,佩默顿(R.B.Pemerton)的《印度的东部边境》(*The Eastern Frontier of India*)出版(1979年重印);1853年,米勒斯(A.J.M.Mills)的《卡西山和贾迪亚山报告》(*Report on the Khasi and Jaintia Hills*)出版(1901年在西隆再版);1875年,安德鲁·威尔森(Andrew Wilson)的《雪屋:从中国西藏穿越喜马拉雅谷地到印度高加索山区的旅途考察报告》(*The Abode of Snow: Observations of a Journey from Chinese Tibet to the Indian Caucasus Through the Upper Valleys of Himalayas*)出版;1878年,布朗里格(H.S. Brownrigg)的《亚洲道路:尼泊尔、不丹、锡金、缅甸以及从阿萨姆到缅甸的道路》(*Routes in Asia. Pt I Routes in Nepaul, Pt II Routes in Bhutan, Pt III Routes in Sikkim, Pt IV, Routes in Burmah, Pt VI, Routes between Assam and Burmah*)出版。其中再版次数最多的是曾为英属政府孟加拉省行政助理和政府秘书的亚历山大·麦肯齐(Sir Alexander Mackenzie)撰写的“孟加拉省东北边境备忘录”(Memorandum on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Bengal),在1884年以《孟加拉省与东北部边境山地部落的政府关系史》为名(*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of Government with the hill tribes of the north east frontier of Bengal*)首次出版并深受欢迎,由于书中涉及英属印度政府官员所接触的阿萨姆山地部落,包括部落民对英印当局的态度以及在谈判过程中的反应等,其中还附录了相关官员的说明与报告。这本根据当地政府记录和文件不断更新内容的报告,后来成为孟加拉省处理阿萨姆地区部落关系的权威指南,现已成为研究印度东北部政治关系的权威资料之一,已多次再版,如1979年以《印度的东北边疆》(*The North East Frontier of India*)为名重印,2012年又再次出版。

## 2. 旨在关注部落社会文化变迁的民族志成果

与非职业学者在南亚游记中涉及道路、关隘以及族群名称等浅表记录不同的是,人类学家更关注这一地区的族源族称、语言文化、社会结构以及宗教仪式等内容,经过多年的对比研究,学者们发现阿萨姆地区至少有200多个部落是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支的蒙古人种(Mongoloid),其婚姻家庭、亲属结构和宗教信仰等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都是学者的关注重点,特别揭示了山地部落民在经历无国家的部落社会、殖民统治以及民族国家社会转型当中的现实难题与发展困境。

这些成果主要包括综述类和单一民族的民族志成果两大类。前者如1926年,埃克斯泰德(E. von Eickstedt)在《印度人》杂志(*Man in India*)上发表的《西部、中部喜马拉雅的种族与类型》(*The Races and Types of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Himalayas*)一文对印度东北部的族群作了类型划分;1950年,海门道夫(Christoph von Furer-Haimendorf)在“皇家艺术社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发表的《印度土著部落》(*The Aboriginal Tribes of India*);1959年,维里尔·埃尔温(Verrier Elwin)的《印度东北部的哲学观念》(*A Philosophy for NEFA*)(2006年再版)、《十九

世纪的印度东北边疆》(*India's North East Fronti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72)和《印度东北边疆的艺术》(*The Art of the Northeast Frontier of India*, 1988); 1976年, 奥(V. V. Rao)的《印度东北部落政治百年》(*A Century of Tribal Politics in North East India 1874-1974*); 1976年, 维迪夫(P. Vidhif)的《印度的部落文化》(*The Tribal Culture of India*)涉及印度部落民的历史、生活和政治等主题(2018年再版); 1984年, 雷格胡维尔·辛哈的《喜马拉雅南麓的宗教与文化》以及2005年, 乌沙·沙玛(Usha Sharma)的《发现印度的东北部》(*Discovery of North East India*)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南亚地区的那迦人一直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如1925年, 威廉·史密斯(William C. Smith)的《阿萨姆的奥那迦部落》(*The Ao Naga Tribe of Assam*)(2002年再版); 1950年, 卡帕迪亚(K.M. Kapadia)的《阿萨姆那迦人的母系世系社会组织: 一项关于社会观念的研究》(*The Matrilineal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agas of Assam: A Study from the Sociological Point of View*); 1969年, 埃尔温的《十九世纪的那迦人》(*The Naga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70年, 海门道夫的《赤裸的那迦人》(*The Naked Nagas*); 1990年, 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与朱利安·雅各布斯(Julian Jacobs)合作出版《那迦人: 印度东北的山地族群》(*The Nagas: Hill peoples of Northeast India*)一书(2012年, 该书由第二作者与新作者合作以同名再度出版); 2009年, 迈克尔·奥皮茨(Michael Oppitz)和托马斯·凯瑟(Thomas Kaiser)合著的《那迦人的认同: 印度东北地方文化变迁》(*Nagas Identities: Changing Local Culture in the Northeast of India*)等。

我们之所以把专业的民族志著述与早期的游记进行划分, 并不是为了提升或者贬低民族志的实用价值。海门道夫凭借着自己在印度50余年扎实的田野调查经验, 被印度东北边境特区管理局授予特派员暨行政助理职位, 协助政府解决领土重组等问题, 而他提交的大量涉及教育等一系列关系部落民利益的议案, 旨在维护和保障部落民的文化和语言免受侵扰, 这是人类学知识回应当地部落民需求的最好例证。而埃尔温的经历也与此类似。从1930年代起, 埃尔温就在印度从事田野调查, 撰写了数十本有关印度东北部部落民的著作, 涉及艺术、哲学、历史以及故事传说等内容; 他还担任印度人类学调查局主任, 拍摄了大量有关部落民的照片与纪录片; 1954年, 他人籍成为印度公民, 在西隆担任印度政府的部落事务顾问, 直到10年后在当地去世。

## 二、佐米尔视野中的南亚研究及其反思

由于受到东印度公司在南亚次大陆的扩张(包括英属印度的殖民统治)、缅甸贡榜王朝的西侵、独立后印度政府的社会治理、中印短暂的边界冲突、孟加拉国独立建国以及难以融入印度共和国等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缠扰, 南亚地区的民族矛盾互相叠加而难以得到彻底解决。斯科特基于东南亚高地的佐米亚理论对于理解南亚民

族关系具有较强解释力。当然，作为地理与民族最具多样性的南亚研究也对佐米亚形成的原因与动力问题进行了反思。

### （一）南亚民族关系的佐米亚解读

斯科特以东南亚高地部落民的“逃避统治”作为切入点来建构低地（谷地）/高地（山地）、政府/无政府和国家空间/超国家空间等二元但不对立的佐米亚理论框架，这对于理解申德尔所说的包括喜马拉雅山以南与不丹以西（南）地区在内的南亚民族关系也极具解释力。

#### 1. 佐米亚框架中的二元但不对立关系

众所周知，生活在低地的民族是采用精耕细作的定居农业，而高地民族盛行刀耕火种农业，这两种生计方式造就了不同民族在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截然不同，而这些差异性又会形成某种形式的互补，如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季节性的贸易关系甚至某些情况下会形成婚姻交换（至少因为低地与高地之间会定期爆发战争，双方都会有通过婚姻来结成联盟的需求），两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其实是一种二元但不对立的关系。

斯科特用高地民族的“逃避”策略来解读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的形成原因，这种逃离行为是对统治和被统治意图的拒绝，是一种主动选择逃避已有的国家统治并预防可能出现国家统治精心设计出来的艺术。具体而言，就是低地民族在国家的严格控制之下，需要定期向君主缴纳赋税和提供劳役服务，因此他们所从事的是一种如栽种稻谷一样的定居农业；而高山民族为了逃避国家的税收管理而设计出一种“逃避农业”（Escape Agriculture），栽种多种多样的作物且采用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如在阿萨姆邦和特里普拉邦被称为“乔姆”（Jhoom）的地方性知识，是一种盛行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古老轮耕种植法。在特里普拉邦的19个部落社会中，“除普提亚人（Bhutias）和查马尔人（Chaimals）以外的所有部落均实行轮耕方式，几乎40%的居民完全依赖这种耕种方式。”<sup>①</sup>一般来说，低地民族总是将自己视为是先进与进步的象征，而将高地民族视为是野蛮与落后的象征，试图通过战争等方式不断扩大对高地民族的控制，将这些“财政的不毛之地”纳入到行政管辖和税收管理当中；然而处于低地边缘地带的高地民族对于国家形态总是表现出一种抗拒态度，他们将低地民族视为剥削者和压迫者，因此他们所谓的“野蛮”，如“分散的居住、混合式的农业、易变的社会结构和对文字的丢弃等方式”，<sup>②</sup>其实是一种“自我野蛮”（Self-Barbarianization）。

---

<sup>①</sup> A.K.Gupta. "Shifting Culti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in Tripura, Northeast India", *Human Ecology*, Springer, (December 2000), 28 (4), P606. doi:10.1023/A:1026491831856, JSTOR 4603374.

<sup>②</sup> 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7-28页。

正因为如此，斯科特把野蛮的高地视为一个民族逃避政治统治而形成的避难所，而不是一个即将由先进的低地来替代的“遗留物”。他说：“一旦我们考虑到‘野蛮人’可能并非是早期存在的遗留物，而是为了保持自主而主动选择了他们的地点、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那么社会进化的文明故事就会彻底地崩溃。”<sup>①</sup>斯科特批判了那种将高地自我管理的民族看作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的观点，特别指出那种认定野蛮的状态必定会为文明的国家社会所取代的观点其实并不可取。

## 2. 南亚族群关系运作的逻辑前提

基于东南亚高地个案的佐米亚理论其实也同样适用于解读从印度东北部的那迦山、米佐山一直延伸到孟加拉国吉大港广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因为两者发生的逻辑背景如出一辙，如国家进入“无政府”高地的目的动机以及引发的民族冲突，南亚四国都面临着要妥善解决这一民族矛盾的难题，就以阿萨姆地区的民族关系为例。

第一，各自为政的前殖民时期。自13世纪以来，阿萨姆河谷分布着阿洪姆、卡查尔和曼尼普尔等地方政权，它们与四周山地（丘陵）的部落社会并无行政上的隶属关系，每个部落都各自为政，没有任何形式的统一，因为河谷的平原人与山地的部落民之间既有正常的贸易往来，也会定期地爆发战争。对于阿洪姆王国来说，西部边境的莫卧儿帝国一直是其最大的威胁，直到17世纪后半叶，阿洪姆军队才驱逐了长期盘踞在高哈蒂一带的莫卧儿军队，以玛纳斯河（Manas River）为界把两国的西部边境确定下来，然而此时的阿洪姆内部已陷入了信仰印度教不同教派的冲突当中，随着毗湿努派与性力派信众的冲突不断升级，阿洪姆王国开始出现分裂迹象并最终走向了衰落。

第二，划线而治的殖民时期。由于“野蛮边陲是重要物资和人力资本的关键来源”，<sup>②</sup>而阿萨姆地区最有价值的就是茶树资源。19世纪早期，东印度公司在阿萨姆地区发现野生茶树，于1834年成立了茶叶委员会，1838年，阿萨姆大面积的蚕桑园都被改为了茶叶种植园，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阿萨姆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茶叶产区，1888年，“印度境内的茶叶产量首次达到了8600万磅”，<sup>③</sup>印度成为英国茶叶消费市场的主要供应者，印度茶也成为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为了不断扩大茶叶种植面积，东印度公司发动了数十次的山区远征才暂时将山地部落征服，然而部落民捣毁茶园并且袭击贸易点的反抗却从未停止过。正是考虑到山地部落的复杂性，东印度公司（随后的英属印度政府）才将山地部落划分为两大类型，如在税收非常困难且部落民敌视态度严重的那迦山、路赛山以及北卡查尔

<sup>①</sup> 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1页。

<sup>②</sup> 同上，第7页。

<sup>③</sup> 罗伊·莫克塞姆著，毕小青译：《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2页。



山一带规定不准平原人与部落民从事贸易交换，给予当地部落头人以行政权和部分司法权来对部落社会的内部进行管理，而一旦涉及部落间的争端时，头人也需服从当地地方官员的仲裁；在阿萨姆河谷南部和西部的加洛山、米克尔山、卡西山以及贾迪亚山等不那么敌对的地区则允许平原人与部落民进行贸易。1873年，英印殖民政府正式制定《孟加拉东部边境章程》（*The Bengal Eastern Frontier Regulation of 1873*），划定阿萨姆地区的内外线，规定所有英国臣民以及外国居民，在没有通行证或许可证的情况下不得越过“内线”，而“外线”则是国际边界，对于内外线之间的中间地带，既不收税，也不设立行政机构。其实英印殖民政府划定这条人为界线的目的之一就是“试图以他们一直习惯的假想线来限制那迦人的游荡和交易习惯”，<sup>①</sup>这种将平原人与部落民分而治之的划线政治，为印度东北部地区在印度独立后不久就陷入旷日持久的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

第三，印度独立后的民族国家时期。虽然殖民统治基于税收需要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原因，倾向于将山地民族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管理，然而受限于种种现实条件而无法实施，最后不得不采取划治而治的变通做法，然而到了民族国家时期，国家运用行政手段来推动部落社会向现代化或者先进性转型的动机十分强烈，“由于作为农业国家发展的最后形态，民族国家对于其他非国家政体充满敌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的权力在理论上就是将其垄断的强制力全部投入至其统治区域的边缘”。<sup>②</sup>1950年代，印度政府通过支付土邦王公年金（Privy Purse）的方式，换取土邦并入印度联邦，声称只需交出国防、外交和交通三项权利，其余权利仍土邦王公掌握，中央政府不会干涉。1971年，印度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土邦君主年金，其称号亦被废除，王公的资产多被充公没收。也就是说，印度政府完全收回了500多个土邦的自治权利，其中就包括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和特里普拉两个土邦，这样一来就激起了阿萨姆平原人和部落民之间持久的抗拒与反抗，而这一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

1947年印巴分治后，东孟加拉的分离使印度东北部失去与外界联结的陆路和水上通道，只有全长22千米的西里古里走廊将其与印度内陆连接起来，因此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71年孟加拉国正式建立，西里古里走廊成为战争难民和非法移民的通道困境相继出现。当时东巴基斯坦印度教徒难民大量涌入阿萨姆地区，再加上非法移民也大量地进入，从而加剧了外来者与本地人（平原人与部落民）的紧张关系，而2019年12月在印度多地爆发的导致多人死亡的严重骚乱，就是由于印度政府的《公

---

<sup>①</sup> Khongreiw, Rammathot.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es of Peoples on the Margins: A Critique of Northeast India's Durable Disorder",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Sage Publications, Inc., (October–December 2009) 34 (4), P448. doi:10.1177/030437540903400404, JSTOR 40645285.

<sup>②</sup> 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页。



民身份修订法案》给予数以百万计的非移民以印度公民身份而引发的。

## （二）南亚研究的经验材料对佐米亚理论的反思

南亚研究成果丰富了对佐米亚形成原因和动力选项的分析，加深了对于高地民族的非同质性理解时，也推动了学术界对佐米亚进行理论反思。如阿萨姆地区的那迦兰邦、米佐拉姆邦以及梅加拉亚邦是三个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山地邦，部落民信仰的是“低地人救赎宗教的大传统”，而不是斯科特所说的高地人的“万物有灵论。”<sup>①</sup>虽然诸如此类的观点有明显出入，但不能因此就否认斯科特以“策略定位”（Strategic Positionings）所阐发的佐米亚理论对于理解南亚民族关系及其运作逻辑的启发性。

### 1. 茶园经济是南亚佐米亚区域形成的重要动力

斯科特认为低地国家一次又一次的军事扩张才使得低地民族（自主或者被迫）向高地迁徙，高地民族成为“逃避者（Runaway）、逃亡者（Fugitive）或被放逐者（Maroon）”<sup>②</sup>的代名词，这一说法夸大了逃避定居农业和国家决定性力量的作用，而将影响高地民族生活的原因简单化以及其他的动力机制最小化，从而引起对佐米亚理论的诸多争议。阿萨姆地区的环境与经济因素对于佐米亚的形成原因与动力具有不同的表现。首先地形地貌的原因不能忽视，如印度东北部山高坡陡林茂，道路崎岖难行，从而让生活在此的不同民族之间缺乏必要的社会交往；再者，阿萨姆地区不断扩大的茶叶种植园是形成佐米亚充足的经济动力。

正如之前所说的，至少从13世纪开始，阿萨姆地区的阿洪姆王国与孟加拉省的莫卧儿帝国与山地的部落之间虽时有战争，但前者并不能将部落民完全纳入王国的行政管辖之中，19世纪中期以来茶叶的规模化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才是佐米亚形成的最重要动力。1880年，阿萨姆地区已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茶叶产区，“全境拥有800多个中型和大型茶叶种植园，另外还有20多万个小型茶园，平均每年出产茶叶超过48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近20%”。<sup>③</sup>随着茶叶种植园的面积不断扩大，大批政府行政人员、学校教师、种植园主和尼泊尔茶园工涌入东北部地区，此外还有大量从事森林砍伐、铺路架桥、开山采矿以及农业耕种的各类劳动力，他们前往印度东北部的原因并非是遭受压迫而被逼逃离，而是受到茶园经济的利润驱使，而不断扩大的茶园经济，进一步激化了高地部落民与这些外来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1882年，塞缪尔·白尔顿（Samuel Baidon）的《印度茶业》（*The Tea Industry India*）是最早描写英国种植者在印度植茶经历的游记（该书于2012年重印）；2010年，伊丽莎白·考斯克（Elizabeth Kolsky）的《英属印度的殖民正义》（*Colonial Justice*

① 詹姆士·斯科特著，王晓毅译：《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页。

② 同上，第286页。

③ 林颐：《19世纪，印度茶业如何借力中国——读〈绿色黄金〉》，《中国茶叶》，2017年第4期，第45-46页。

in British India) 有一章内容专门涉及阿萨姆茶园中的法律与暴力; 2011年, 杰伊塔·萨姆 (Jayeta Sharma) 的《帝国的花园: 阿萨姆和印度制造》( *Empire's Garden: Assam and the making of India* ) 涉及阿萨姆茶园经济发展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 2013年, 萨拉·贝斯克 (Sarah Besky) 的《大吉岭特色: 印度茶园公平贸易中的劳动与正义》( *The Darjeeling Distinction: Labor and Justice on Fair-Trade Tea Plantations in India* ) 也探讨了世界上最昂贵茶叶之一的大吉岭茶的茶工工资与公平贸易之间的关系, 这对于理解阿萨姆茶园经济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2. 南亚四国面临独立建国与族群自治的多元选择

虽然斯科特把高地民族称为无政府主义者, 认为他们依赖自我管理而内部相对平等, 然而他对于高地民族之间的关系则语焉不详, 其实阿萨姆地区山地部落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 他们之间也存在剧烈的冲突, 这样一来, 就使得该地区的民族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如阿萨姆的平原人与部落民有冲突, 部落民将主要信仰印度教的阿萨姆人和孟加拉人视为剥削者, 而平原人则将部落民视为阻碍平原发展的落后人群, 而且“大量涌入的外来者与阿萨姆本地人也有着严重的利益冲突”。<sup>①</sup>

近百年南亚地区不同民族在独立建国 / 族群自治的政治诉求中不断切换, 如印度阿萨姆邦、曼尼普尔邦以及那迦兰邦原来都是谋求独立建国的, 最后在印度政府答应分邦的情况下才妥协为单独建邦。1960年, 阿萨姆语成为阿萨姆邦的官方语言, 刺激了非阿萨姆人寻求成立由部落民组成的山地邦; 1972年, 阿萨姆语成为整个阿萨姆邦的教学语言, 山地部落民在反对阿萨姆同化时也相继发动了武装暴动, 最终卡西人和加洛人要求从阿萨姆邦分离出来, 联合组建了梅加拉亚邦。

此外, 阿萨姆地区的不同山地部落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 较为发达的部落将较弱小的部落视为社会进步的障碍, 双方都将进一步隔离 (分邦) 视为最后的解决方案, 但是他们对于到底是要争取独立建国还是民族自治的诉求并不总是一致。如 1929年 1月, 那加人成立民族主义组织“那加人俱乐部”向英属印度政府提出独立要求; 1947年 8月, 那加民族委员会 (Naga National Council-NNC) 反对印度政府接管那加兰, 要求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加兰”, 其范围覆盖今天的那加兰、曼尼普尔、阿萨姆和缅甸境内的所有那加人的聚居区; 1952年, 那加民族委员会开始组织武装斗争; 1956年 3月, 那加人宣布成立“那加联邦政府”, 选举总理, 并组建了一支约为 5000 人的那加联邦军; 1963年, 那加兰由中央管辖区升格为独立的那加兰邦; 1975年 11月, 那加民族委员会与印度政府签署“西隆协定”, 表示愿意接受《印度宪法》并同意放下武器; 1980年, 那迦人成立的“那加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

---

<sup>①</sup> Preeti Gill and Samrat Choudhary.(Eds)*Insider Outsider: Belonging and Unbelonging in North-East India*.New Delhi:Amaryllis.2019.Myron Weier.*Sons of the soil: Migration and Ethnic Conflict in In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

(National Socialist Council of Nagaland-NSCN)是当时最激进和最强大的反政府组织,直到2015年才与印度政府达成永久的停火协议。

正如西伯尼·恰伯(Shibani Kinkar Chaube)所说的“在孟加拉人分裂之后,部落的数量远远超过了部落,部落通过偶尔的暴力和左翼政治来表达生存的悲惨状态”。<sup>①</sup>这一状况也在尼泊尔上演,如1995年,尼泊尔的尼瓦人成立尼瓦尔民族论坛,2003年成立的尼瓦尔民族组织更是明确提出要在尼瓦尔人聚居区实行自治的政治要求;2009年,塔鲁人组成了民族主义政党;作为近代以来移居尼泊尔的印度人后裔的马德西人组建了马德西联合民主阵线代表自身群体的利益诉求,提出要建立马德西自治省的政治主张而招致了尼泊尔当地族群的强烈不满,从而导致其国内局势长期陷入动荡不安之中。

### 三、南亚佐米亚研究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从地理上说,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毗邻南亚与东南亚的佐米亚区域,然而中国学者关于佐米亚重要区域的“南亚研究总体上处于失语状况”,<sup>②</sup>现有成果大多是从历史文化角度,对涉及南亚地区的民族族称、语言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等外文材料进行编译或者观点综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中国周边国家或者地区的推进,迫切需要从微观视角针对地方层面(如南亚佐米亚区域)进行实证研究,由于“民族志从来都是在国家体系形成和世界政治经济进展这一历史变迁的背景下写作出来的”,<sup>③</sup>而南亚研究作为我国学术研究的新增长点,既可以为我国政府制定促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落地政策提供必要的参考,也可以带来对佐米亚理论更加多元的理解或者得到更为平衡的观点,而结合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也可以促进中国学术研究的方法反思与理论创新。

#### (一) 南亚佐米亚研究的现实意义

2021年,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特别致辞,他指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④</sup>而要在周边国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离不开南亚地区的参与。南亚佐米亚区域最早见诸中国文字是公元5世纪的《佛国记》和公元7世纪的《大唐西域记》,在后者的卷十中,

<sup>①</sup> Shibani Kinkar Chaube. “Interethnic Politics in Northeast Indi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odern Sociology*, (Autumn 1975)5(2), P195, JSTOR 41421530.

<sup>②</sup> 国内至今没有一部关于印度东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人类学民族志;大多数宏观研究是建立在对外文资料以及外网观点的编译或观点综述上。

<sup>③</sup> 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尔库斯著,高丙中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

<sup>④</sup>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人民日报》,2021年1月26日,第2版。

玄奘称为迦摩缕波（Kamarupa）国（特里普拉语称其为临水之地）的就在现在的高哈蒂一带，“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二月行，入蜀西南之境”。<sup>①</sup>这是从阿萨姆地区经由缅甸到达中国西南边境的明确记载。20世纪60年代之前，虽然谭云山、张大千、戴季陶、太虚、虚云和东初等人都曾到过比哈尔省的菩提迦耶、孟加拉省的大吉岭以及尼泊尔的蓝毗尼等佛教圣地，也有一些行记或短文记录自己朝参佛教圣地的感受，然而并未提及这一地区的历史、地理与族群等内容。

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往往是通过转译与综述二手资料来进行南亚研究，而对于那些尚无文献资料而必须采用田野调查法来进行研究的对象则一无所知，这一研究导向的弊端十分明显，即没有关于南亚地区民族志的描述性研究，何来高屋建瓴的分析性研究？也就是说，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人类学和民族学对于南亚人文地理知识的缺乏，已经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知识性短板，因此，中国学者进入南亚地区已经不仅仅是学术兴趣与学术转向的问题，而是国家战略需要的问题。通过跨国的学术合作、研究区域细化以及应用性研究等，才能提出针对性强的结论，为政府制定推动南亚“一带一路”项目顺利落地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照。

## （二）南亚佐米亚研究的学术价值

由于南亚地区交织着跨国流动族群与本地族群在生态环境、经济地位以及政治诉求方面的冲突，而这些生态、经济以及政治问题又与宗教信仰和身份认同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从而影响南亚四国之间、南亚与东南亚之间以及我国与南亚之间的社会发展。截止到2000年，在数字喜马拉雅项目网站<sup>②</sup>上可以确认至少有100余部著作是关于南亚民族与社会的成果，其中大多数是海门道夫和埃尔温等西方学者的著作。自1948年以来，印度人类学调查局的工作简报、评估报告和人类学著作也开始关注这一区域的民族、语言、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等，由于南亚民族在现代社会中同样经历着语言消失、人口迁移、村落凋敝以及民族冲突凸显等一系列的社会变迁，从而维持了其作为区域研究学术高地的地位，也应该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新领域之一。

南亚佐米亚地区与中国人类学研究对象有着最直接关系的是以下两类人群，生活在尼泊尔、不丹和印度等操藏缅语族语言的各族群，生活在阿萨姆地区的阿萨姆人，前者与中国数以百万计藏语系佛教信仰者之间存在宗教、文化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交往，后者与云南德宏傣族以及泰国泰族之间的社会联系都需要展开更细化的

---

① 玄奘撰，章巽点校：《大唐西域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2页。

② 2000年，剑桥大学社会学系启动了由艾伦·麦克法兰等人设计的数字喜马拉雅项目（用数字化技术展示从喜马拉雅地区获得的人类学档案和影像资料）；2005年以后，该项目转移到了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2014年，项目正式落户我国四川大学的旅游与文化学院。

研究，这一过程纵然不是全程由中国学者参与，也应该是就某一主题由沿线国家（中国、印度、孟加拉国、泰国和缅甸）学者或者长期跟进这一主题的其他英美西方学者分段来做，这样一来研究内容可以平衡各方学者的观点，如对一个研究对象的不同侧面进行研究，或者不同对象的同一现象进行横向与纵向的综合研究，这种类似合作式的民族志将消减作者因自身不同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文化偏见，带来对佐米亚理论更为平衡的解读。现在已经产生了不少这样的尝试，如2005年，萨巴（T. B. Subba）主编的《人类学印度东北部手册》（*North east India A Handbook of Anthropology*）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由19位作者分别撰写；2017年由萨塔克·森古塔（Sarthak Sengupta）主编的《当代人类学的印度东部与东北部研究》（*Contemporary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 Eastern and North Eastern India*）也汇集了38位学者从各自学科领域所撰写的部落种姓、史前艺术、儿童健康、习惯法以及宗教传统等内容，不仅有助于开展人类学专业的教学与科研活动，关心该区域的发展工作者和政策决策者也能从中获益，更主要的是有利于向普通公众普及学科知识，满足其对于特定区域研究领域的好奇心。

由于南亚地区的族群冲突由来已久，其他学科学者往往会对冲突类型与国家治理感兴趣，也就是说，更多关注的是冲突一方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而人类学则是对于冲突的部落之间或者部落内部的人群及其命运感兴趣。如对于生活在尼泊尔、印度以及不丹的那加人而言，现有的学术研究还存在若干的空白地带，因为那加人本是一个总称，由许多彼此之间语言不同的部落组成，如现在的印度那加兰邦就由“安加米那加（Angami Naga）、奥那加（Ao Naga）、查克尚那加（Chakhesang Naga）、长那加（Chang Naga）、黑安纽岗那加（Khamniungan Naga）、洛热那加（Lotha Naga）、霍姆那加（Phom Naga）、波丘里那加（Pochury Naga）、伦玛那加（Rengma Naga）、桑塔姆那加（Sangtan Naga）、苏米那加（Sumi Naga）、伊姆长格那加（Yimchunger Naga）、和泽美-亮格萨那加（Zeme-Liangasa Naga）等16个部落组成的”，<sup>①</sup>每个部落都有不同的语言、服饰与习俗，只有深入地了解不同部落民的日常经历，不同部落在社会文化与习俗方面的独特性等内容，才能理解其政治诉求的相同与殊异，并进而寻求平息冲突的解决途径。当然，人类学研究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能最大程度上发挥族群和谐的作用，为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设计方案，使其能够应对与适应当代社会变迁，这也是其重要功能之一。

[责任编辑：李丽]

---

<sup>①</sup> Nayak, Purusottam. *Some Facts and Figures on Development Attainments in Nagaland*, North Eastern Hill University, (12 October 2013), p.2.